

十年來的匪俄鬥爭

尹慶耀

十年不是一個短時期，匪俄鬥爭不是一個小題目，而編者先生所能給我的不是一個大篇幅，因此，一切敘述與分析，就不得不設法「從簡」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毛共在一篇文章裏說：「俗語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當然不是現在才開始的」（註一）。談匪俄鬥爭，捨掉一九五〇年代，單從六〇年代談起，難免會有些交代不清（由於因果關係，本文敘述無法嚴格地以十年為限）。不過，六〇年代以降，匪俄關係的變化是够大的。

記得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日，陳毅還在強調「中（共）蘇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壘」。曾幾何時，那個「同盟」和那個「堡壘」都已崩潰，連陳毅這個人也銷聲匿跡了！

一 矛盾不斷升級

一九五七年二月廿七日，毛澤東在偽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其中曾大罵蘇俄。但當同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那篇講詞時，罵俄的一段被刪掉。

在那篇講詞裏，毛澤東之所謂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共黨傳統理論中的非對抗性矛盾，所謂敵我矛盾就是共黨傳統理論中的對抗性矛盾。當時毛澤東把匪俄矛盾歸入那一類，手中無可靠資料查證。但由六〇年代到現在，正是匪俄之間由人民內部矛盾走向敵我矛盾，由非對抗性矛盾走向對抗性矛盾的過程。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黑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新年招待會上說：共產黨之間的歧見，好像一個家庭中鬧意見，如果資本主義干涉，就同它鬥爭。同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刊載的文章，標題為「不許美帝主義插手中蘇分歧」。從同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毛共連續發表九篇文章，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其八評標題為「無產階級革命和黑魯曉夫修正主義

」，已經公開斥責蘇共為修正主義。不過，在此一時期，毛共仍然表示它和蘇俄之間，是「小爭論，大團結」。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黑魯曉夫下台。十一月周恩來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慶典，七日「人民日報」社論，以「在偉大的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為題，文中強調「我們相信，中蘇兩國兩黨之間暫時出現的困難，終究只是歷史的插曲，是能够逐步解決的。中蘇團結一定能夠恢復和不斷加強」。看來當時毛共還有對蘇俄和解之意。可是，布里茲涅夫當面告訴周恩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上，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他們（布里茲涅夫等）同黑魯曉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註二）。

經過這一次波折，毛共似乎已對蘇俄斷了念。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偽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就在對外政策總線中，把蘇俄從社會主義陣營中剔除。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兩編輯部發表聯合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文中聲言毛共同蘇俄「在當代一切根本問題上針鋒相對，有互相分開的東西，沒有聯合起來的東西，有對立的東西，沒有共同的東西」。「現在，擺在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面前的任務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同為美帝國主義效勞的修正主義份子劃清界限，清除黑魯曉夫修正主義，迎接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毛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聲言反帝必須反修，要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美統一戰線，而拒絕將「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包括在內。一九六八年八月廿日夜，蘇俄糾合五國軍隊侵入捷克，廿三日「人民日報」斥蘇俄為社會帝國主義。九月十七日毛、林、周致電阿爾巴尼亞，支持其正式退出華沙公約，聲言「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十月卅一日毛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事實上號召組織反美反蘇統一

戰線。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寶島事件後，毛共斥蘇俄為「新沙皇」。四月十四日毛共九大通過的黨章總綱，明定「為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修叛徒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而共同奮鬥」。

右述是匪俄鬥爭量變質變的簡略過程。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毛共發表「公告」，準備邀尼克森往訪北平。看來，毛共或許不再堅持「不許美帝國主義插手中蘇分歧」了。

一、匪俄爭些什麼

匪俄之間究竟爭些什麼？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毛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裏說，那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分歧，要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分歧，要不要社會主義陣營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問題。這些話太籠統。同年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給蘇俄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裏，說毛共對反史問題先附和後反對，而匪俄之間，關於和平過渡和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全人類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等等，雙方主張不同。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世界共黨會議莫斯科宣言裏說：「我們時代的主要內容是由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開始的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其實，早在三十年以前史達林就說過：「十月革命並不是單只『民族範圍內』的革命。它首先就是國際性世界性的革命，因為它是全世界人類史中由

資本主義舊世界進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註三）。更早一些，史達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裏講到戰略時，指十月革命以後，世界革命時代即已開始，這一階段的戰略目標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運用這專政作為支撐點，以便在世界各國推翻帝國主義」（註四）。這是說十月革命以後，共黨的任務就是赤化世界。這一點是永遠不變的。

所謂戰略乃是「革命力量」的佈置計劃，那包括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力量在內，這又須從分析和利用世界範圍的各種矛盾入手。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一文，以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等為藍本，指出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壟斷

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

對於四大矛盾之說，蘇俄當然沒有異議，問題是這些矛盾何者是基本的？以何者為重？蘇俄認為最基本的乃是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蘇俄不希望兩者之間引起戰爭，以免本身被毀滅，因而強調和平共處，但「和平共處是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不但不排斥、而且為解放鬥爭、人民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創造最有利的條件」（註五）。蘇俄自稱它團結着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國際工人階級和民族解放運動等三大力量，它是以和平共處掩護以蘇俄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發展其經濟與軍事力量，而後以實力支援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和若干民族的民族鬥爭，從內部和從外部來困擾、削弱和打擊資本主義陣營。

毛共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根本不同社會制度的矛盾，這種矛盾毫無疑問是很尖銳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能把世界範圍內的矛盾，簡單地看成只是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依毛共看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它把那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提到鬥爭的第一位。甚至說對那些地區人民的革命採取什麼態度，「是區別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標誌」。

毛共並不根本否定和平共處。它說「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共處政策，有利於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有利於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有利於孤立帝國主義侵略和戰爭勢力」。但是，「在任何時候，都不應當把和平共處引伸到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和壓迫國家、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的關係方面，不應當把和平共處說成是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要內容，更不應當說什麼和平共處是全人類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毛共反對和平過渡，堅持「和平共處根本不能代替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註六）。

匪俄世界革命的目標一致，埋葬自由世界的方法不同。正如同已死的印尼共黨頭子艾地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在雅加達市委會所說：「國際共黨間的糾紛，是埋葬資本主義的方法之爭」。然而，在匪俄理論和策略的分歧背後，還隱藏着領導權之爭。蘇共曾指責毛共想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

毛共不肯承認。可是在雙方大論戰過程中，有時毛共也掩飾不了它的此種企圖。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毛共在「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即評一文裏，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話，說明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的工人，都曾暫時處於各國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列。但那不是長期固定的，「如果條件變化了，另外的黨就可能走在運動的前列」。而且，原在前列的黨只要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就會喪失前列的地位。在毛共眼中，蘇共早已「修」了，豈不該讓出前列的地位？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共那篇駁蘇共「聯合行動」的文章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列寧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毛澤東提出了「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的口號，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關於世界革命所提出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戰略思想」。這是把毛澤東看作馬列的直接繼承人。一九六六年毛共十一中全會公報說：「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同年第八期「紅旗」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則稱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峯」。如此說來，即使馬克思列寧復活，都要向毛澤東學習馬列主義了，這個運動難道還不該由毛來領導？

本來，依照蘇俄的世界革命方式，除了蘇俄之外，沒有人够資格領導。毛共把革命重心擺在亞、非、拉丁美洲，那是世界的鄉村地區，毛澤東可在那裏鼓吹「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聯合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以「人民戰爭」的方式推行世界革命，其領導權似乎就可以讓給毛澤東了。

捷克事件後，蘇共不僅「修」而且「帝」了，於是毛共的國際統一戰線就包含反帝和反修雙重意義。林彪在向毛共九大提出的政治報告中，對四大矛盾略加修正。他把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平列，毛共可在那些國家內部鼓動階級鬥爭；他把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並舉，毛共可在世界範圍內煽惑反帝反社會帝的鬥爭。蘇共既已成為革命對象，毛共豈不成爲共產主義運動「唯一合法」的領導者。當然這是就毛共一方面說的。

匪俄鬥爭很快影響到雙方的經濟關係。本來，毛共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喊出過「在今後十五年內，要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口號（註七）。可是，一九五八年開始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不曾獲得俄援，同年夏，毛澤東才搞土洋並用的「五並舉」，兩條腿走路的大躍進（註八）。躍進失敗，毛澤東丟掉了偽政權主席，接着又是連續三年的大災害，而蘇俄於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通知毛共，於一個月內撤退在中國大陸工作的一、三九〇名專家，撕毀了三四三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二五七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毛共雖然願意挽留那些專家，希望蘇俄重新考慮和改變決定，但蘇俄不會答應（註九）。經過這次沉重的打擊，毛共在經濟上就要真的「自力更生」了。

據毛共事後追述：「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這個期間，由於蘇聯修正主義者的破壞和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我國遭受了暫時經濟困難。……在經濟困難的幾年裏，牛鬼蛇神紛紛出籠，反動資產階級向黨向社會主義的進攻，達到了極其猖獗的程度」（註一〇）。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至十八日，毛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縮小基本建設規模，調整工業發展速度，採取「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毛共經濟進入調整期，那已是劉少奇當權時代。吳晗的「海瑞罷官」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北京文藝」上發表，而鄧拓等人的「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都於同年開始在北平的報章雜誌上連載。同年十一月，彭真在劉少奇的支持下，率領鄧拓等到北平西郊動物園暢觀樓，去搜查毛澤東的著作、文件和指示，為「黑魯曉夫式的祕密報告準備材料」。於是，一九六二年一月毛共中央工作會議席上，毛澤東就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同年九月毛共八屆十中全會，他更進一步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且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這是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的完成，也是他對內（反資派）對外（反蘇修）鬥爭新姿態的萌芽。

蘇俄在伊犁地區進行顛覆活動，引誘和脅迫六萬多人跑到蘇俄境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黑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作報告時，指責有人說蘇俄在古巴危機中向帝國主義投降，特別提出澳門和香港，說「從這些地方發出來的氣味一點也不比殖民主義在果阿發出的味道好聞」（註一），用來譏諷毛共。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指責提出香港、澳門問題的人，是「從糞坑裏揀起……一塊石頭」。並且質問：「你們提出這一類問題，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條約問題通通翻出來，進行一次總清算呢？」所謂領土爭論，就從此燃起。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七日毛共建議邊界談判，該項談判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在北平舉行但無結果。同年七月十日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五人代表團談話，指責蘇俄侵佔的領土太多。另一方面，毛共稱一九六四年以來，蘇俄大量增兵中蘇邊界，進行武裝挑釁。從是年十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以前，蘇俄挑起的邊境事件達四、一八九起之多（註一二）。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開始的珍寶島事件，蘇俄曾出動大批武裝部隊和裝甲車、卡車（註一三）。同年八月十三日，蘇俄出動直升機兩架，坦克、裝甲車數十輛和武裝部隊數百名，侵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縱深達兩公里（註一四）。事態如果繼續發展，很可能引起一場較大的軍事衝突，那是違反共黨以政治鬥爭為主的傳統的。何況西方在當時過分渲染雙方戰爭的可能性，使雙方都存有戒心，以免受西方的挑撥利用。同年九月十一日柯錫金與周恩來在北平南苑機場晤談，就邊界、貿易及雙方關係中其他問題交換意見，於是匪俄鬥爭又轉入談判階段，而戰爭危機大為減少。但同年偽慶紀念口號中，毛共呼籲「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為與蘇俄舉行邊界談判，十月七日偽政權聲明：「如果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的戰略基地，那就是戰爭，那就是侵略，七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反抗，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它害怕蘇俄突襲的心情，可謂溢於言表。

一九六九年十月廿日匪俄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在北平開始。毛共在上述聲明中表示：「中國並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這些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雖然說，「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約。

件地歸還，但是，雙方可以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上的這些地方作必要的調整」。毛共要求蘇俄承認前述條約是不平等條約，而它從事談判的主要目的則是：「在中蘇邊界問題通過和平談判取得全面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中蘇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一切爭議地區，即根據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中交換的地圖雙方邊界線畫法不一致的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毛共此一立場迄今不變。可是，蘇俄既不肯承認過去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又不肯在邊界上減輕對毛共的軍事壓力。因此，兩年來的邊界談判毫無進展，甚至時有停頓之說。

四 匪俄鬥爭與國際共黨

匪俄鬥爭對共產集團乃至整個世界，都有其影響。而雙方的鬥爭形式，也隨着國際局勢在不斷演變。

一九五七年八月廿六日，蘇俄發表演洲際飛彈實驗成功，十月四日旅伴衛星一號升空，十一月三日又打上了旅伴衛星二號。顯然，蘇俄已在太空科學方面領先美國，而核子差距之說，震撼着當時的世界。同年十月十五日，匪俄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蘇俄應允協助毛共發展核武器。十一月間毛澤東率龐大代表團赴俄，十八日在世界共黨會議中發表「東風壓倒西風」以及狂妄的核戰理論，他似乎是想藉蘇俄核子優勢加緊進行世界革命。但是，蘇俄自知它在核武器方面並未超過美國，更不願由毛共挑起戰爭使蘇俄在核武器攻擊下毀滅，這是—九五九年六月廿日蘇俄單方面撕毀國防新協定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同年一月二日蘇俄打上月球火箭「Lunik」一號，九月十二日第二號月球火箭着陸月球，黑魯曉夫手捧着該火箭的模型，於九月十五日去訪問美國，和艾森豪創造大衛營精神，看來他是要以實力為背景，脅迫美國和它和平共處。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發生了U——二機事件，艾森豪總統表明U——二機偵察蘇俄是他核准的，而且已行之多時，這顯示了蘇俄空防的薄弱，也揭穿了核子差距的神話。同月十六日，黑魯曉夫在巴黎聲稱，如果美國不對飛機事件道歉，蘇俄即不參加高層會議，使得那次預定已久的會議流產，大衛營精神也隨之破滅。另一方面，匪俄之間的爭論也方興未艾。同年六月廿日

至廿五日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大會，黑魯曉夫於廿一日演說，攻擊毛共為數條主義，並散發長達八十頁的小冊子批評毛共。廿六日彭真在隨後召開的

「兄弟黨」會議中散發書面聲明，斥責黑魯曉夫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了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匪俄之爭在共產集團內部，即從此公開。

同年「十·一」偽慶時，沒有蘇俄的代表團參加，蘇俄駐平大使契爾沃年科也不在北平。共產國家代表中最高等級人物是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凱萊齊。在天安門上，毛澤東的左邊是緬甸總理宇努，右邊是阿爾及利亞叛軍領袖阿巴斯。數千外賓來自亞、非、拉丁美洲，五十萬人大遊行也以民兵為主。這表示毛澤東在世界革命戰略上，已決心與蘇俄分道揚鑣。同年十一月五日劉少奇率團赴俄，出席八十一國共黨會議。在此會議中，鄧小平曾以四小時半時間，宣讀長達一〇八頁的冗長報告，說明毛共的立場。在會議「聲明」（十二月五日）發表之前，由於匪俄爭執，經過三〇〇次修正之後始達成協議，而匪俄衝突，在國際共黨中也就盡人皆知。

在羅工人黨大會和八十一國共黨會議中，阿爾巴尼亞都堅決支持毛共。

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廿二次代表大會中，阿共不曾被邀請。十七日由黑魯曉夫領頭攻擊阿共，十九日周恩來在會中致詞，斥蘇共在自己的代表大會上指責兄弟黨，「不能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鄭重態度」。十二月十日蘇俄對阿絕交，在共產國家關係中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先例。

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毛共致函蘇共，支持印尼、瑞典、北越、英國、紐西蘭各共黨召開世界共黨代表會議的提議，但當時蘇共反對此項會議。十月初蘇俄在印度尼西亞召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會議」，蘇俄口頭上主張匪印和好，實際上繼續對印度給予援助。同月廿二日甘迺迪在海上封鎖古巴，毛共表面支持古巴反美，實際上指責蘇俄投降。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三年一月，保、匈、義、捷、東德各共黨代表大會中，蘇共唆使其兄弟黨圍攻毛共。這些，或許是蘇共在國際共黨中製造輿論，為將來把毛共排擠於它們那個行列之外作準備。

一九六三年二月廿一日，蘇共致函毛共，贊成召開世共會議，但建議先舉行毛蘇共黨會議。這個兩黨會議於同年七月五日至廿日在莫斯科舉行，結果決裂。但美、英、蘇三國局部禁試條約，却於同月廿五日成立。黑魯曉夫緩和對西方關係，集中精力對付毛共的做法，使得北越、北韓不滿而更親近毛共，而東歐各國也想乘毛俄鬥爭機會，提高其發言地位。也正是一九六三

年七月，「經互會」第十八次大會，黑魯曉夫原擬提議成立超國家權力的計劃執行機構，因羅共反對而擱淺。

一九六四年四月，羅共機關報「火花報」發表「主權宣言」，宣稱有向獨自的社會主義之路前進的「權利」。同年六、七月間，寮越局勢吃緊，黑魯曉夫方在北歐旅行。八月間東京灣事件爆發，黑魯曉夫在伏爾加河流域視察農村。由於顧及到對西方的關係，蘇俄對上述事件的反應遲緩而無力。同年五月五日，蘇俄代表在聯合國建議邀北越代表赴安理會作證，竟遭北越拒絕。在東歐，同年七月黑魯曉夫之婿阿祖培訪問西德，為黑魯曉夫探路，他在波昂大放厥詞，引起東德因懷疑將被出賣而大肆叫囂。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蘇俄致函毛共，提議年內召開世共會議預備會，毛共反對。七月三十日蘇俄通知毛共，定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二十六國共黨代表組成的預備會議，毛共反對且聲言該項會議將招致分裂。截至十月十四日，被邀請的廿六個共黨覆函接受的一個，通告缺席或未答覆者十四個。十四個掌握政權的共黨，南共未被邀，毛共、阿共、韓共拒絕，北越、波共、羅共、古共遲不作答。十五日黑魯曉夫下台，預備會議延期。布、柯政權登台後，蘇共不斷與各國共黨進行雙邊與多邊會晤。一九六五年一月謝列平訪問偽蒙，二月柯錫金經北平訪問北越，歸途中訪問北韓。他於七日在河內巴亭廣場，對八萬羣衆揚言蘇俄決不坐視美國攻擊北越。當晚越共游擊隊襲擊百里居美軍基地，導致越戰升級。蘇俄要求毛共在援助北越方面聯合行動，毛共堅決拒絕。同年三月一日，共黨會議預備會改稱「協商會晤」，在莫斯科舉行，共有十九個共黨出席，毛共、韓共、北越、阿共、羅共均未參加。「會晤」公報中，寫進了「聯合行動」和「於適當時機召開共黨國際會議」，使蘇俄在宣傳活動上取得較有利地位。毛共則指其為「分裂會議」，斥責蘇俄實行三假三貞和四聯四反（註一五）。從此，毛共在國際共黨中更加緊其分裂活動，但也使得它本身更形孤立。

一九六六年春，日共書記長宮本顯治率團訪問河內、北平、平壤，主張於反修的同時仍可在支援北越問題上採取聯合行動，北越、北韓贊成而毛共仍堅決反對。自此，毛共與日共、韓共關係轉惡，北越雖仍須依賴毛共支援，但越戰升高後，對蘇俄的現代化武器需要迫切，而發展經濟以支援戰爭，尤需蘇俄的機械設備等援助。於是，亞洲共黨國家的關係逐漸變化（註一六）。

)。但在東歐，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於同年五月七日為羅共成立四十五週年紀念(八日)發表演說，回溯至一九二〇年起，對第三國際加以指責。且指保持軍事集團及國外軍事基地，乃係時代錯誤。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共十一中全會，同月十八日「紅衛兵」第一次集會，毛澤東親子接見。二十日「紅衛兵」就高喊着「破四舊」出現北平街頭。「紅衛兵」的種種暴行，招致多數共產國家的批評，認為是醜化了馬列主義。八月廿二日「紅衛兵」即包围俄使館，侮辱俄外交官。而「紅衛兵」外交於一九六七年迅即影響及於東歐，除阿、羅外與毛共關係普遍惡化。

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事件後，同月廿三日晚，周恩來在羅馬尼亞駐平使館所舉行的羅解放廿四週年紀念招待會中，斥俄為「社會帝國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表示堅決支持羅對抗外來的干涉與侵略。十月一日毛共駐捷使館竟邀請南斯拉夫駐捷官員參加其偽慶活動。至於毛共與阿共的軍經勾結，自更較前加緊。自此以後，毛共即蓄意培植一個對蘇俄懷有敵意的巴爾幹。而蘇俄於捷克事件後所提出的「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等等，尤為毛共所不斷攻擊，藉以離間蘇俄與東歐的感情。

捷克事件使得預定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召開的世共會議再度延期。此一會議雖終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在莫斯科舉行，但毛共、阿共、北越、北韓、南共等等均未參加。出席者七十五個共黨，在會中意見並不完全一致。會議通過基本文件——「現階段的反帝鬥爭任務及共產黨、工人黨和一切反帝力量的聯合行動」，內容係以蘇俄路線為主，但也公開承認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一個國際領導中心，而且文件並未獲得出席共黨的全體簽署。這表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業已分裂，蘇共在此一運動中的絕對領導權業已崩潰。不過同年四月毛共的九全大會，並未邀請國際共黨參加，可見所謂北平中心也還渺茫得很。

當毛共九大開幕時，韓共未有一紙賀電。同年七月間，北平和平壤之間關係逐漸改善。一九七〇年四月初，周恩來訪問平壤，同月底他又跑到大陸西南邊境某地，去激勵中南半島「三國四方」(註一七)的最高會議，是一條由東南亞到東北亞的反美(反蘇、反日)赤色統一戰線，就在毛共赤色衛星的籠罩下組成，這使得蘇俄在亞洲相形冷落。

一九六八年八月，第三次亞非人民團結大會在非舉行，會中毛共代表對蘇俄代表說：「這裏沒有白人的事」。同年底至一九六四年初，周恩來率領陳毅等組成龐大代表團，歷訪亞非十三國，籌開沒有白人參加的亞非會議，就提高了蘇俄的警惕。

毛共與蘇俄的鬥爭，不僅與國際形勢息息相關，抑且對國際形勢加以利用。

一九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機，蘇俄被迫從古巴運回其中程飛彈。這暴露了蘇俄的核武器仍然落後美國，而它沒有遠洋海軍，更是它的致命傷。在此情勢下，蘇俄不得不對西方暫時妥協，然而這不僅加深了共產集團內部的分歧，甚至使蘇俄在亞非集團中，也一時頗為不利。

本來，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盧孟巴死亡，蘇俄攫取剛果的希望就隨之幻滅。同年十二月幾內亞要求蘇俄召回其駐幾大使索羅德，因為他竟然想顛覆親共的幾內亞總統屠瑞。古巴事件後，蘇俄在非洲的不利情勢更加速發展。一九六三年一月，突尼西亞禁止共黨活動，阿爾及利亞也宣佈共黨非法。二月間伊拉克大捕共黨，蘇俄召回其八千名技術人員。當時阿聯既在國內反共，又對俄援表示失望。十一月剛果逮捕兩名蘇俄外交官員及一特派記者，廿一日剛果總理阿杜拉宣佈，蘇俄大使館的全體人員均不受歡迎，必須離開剛果。十二月南非官方指責蘇俄曾答應援助一項巨大的破壞計劃與游擊隊活動，並在南非設一個臨時的革命政府。正是此時，毛共就決定在亞非地區排除蘇俄的勢力。

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三次亞非人民團結大會在非舉行，會中毛共代表對蘇俄代表說：「這裏沒有白人的事」。同年底至一九六四年初，周恩來率領陳毅等組成龐大代表團，歷訪亞非十三國，籌開沒有白人參加的亞非會議，

另一方面，當毛共與蘇俄衝突日漸顯著時，法國也表示要與美國分道揚鑣。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戴高樂在巴黎招待記者，聲明將不計後果，發展其自身的核子武力。美法的矛盾，在古巴事件以後更深加劇。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國禁核協定，毛共和法國同表反對。就在此時，法國竟想藉與毛共建交，來牽制蘇俄，以減輕其對歐洲的威脅，俾法國得以乘機發展，恢復其光榮的傳統地位。這一情勢，立即被毛共利用。

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一日，「人民日報」社論，高唱「中間地帶論」。原文稱：「這個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經獨立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這是第一個中間地帶；另一部分是整個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這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毛共認為：「第二個中間地帶的國家有兩重性，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既剝削和壓迫別人，同時又受到美國的控制、干涉和欺負」。「它們力圖擺脫美國的控制」。因此，毛共要在中間地帶搞反美統一戰線。不過，文中指責「蘇聯領導人追求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夢想」，因而蘇俄也應在被反之列。原文引述了英國首相霍姆、西德總理艾德諾等不滿美國的言論，更引述「法國總統戴高樂在談到法美關係時說：『我們不打算做它的衛星國……我們要獨立，我們要做法國人』」。……日本的統治階級，按照美國報紙的說法，也感染了「戴高樂熱」……。同月間法國和毛共建交，那是毛共在第二中間地帶的收穫，但它的鬥爭重點，無疑是在第一中間地帶。

一九六四年是毛共積極籌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時期，它堅拒蘇俄參加此項會議。一九六五年一月七日，印尼總統蘇卡諾退出聯合國，毛共乃倡議籌組第二聯合國，事雖不成，但第二次亞非會議則決定於同年三月在阿爾及爾舉行。惟因當地工人罷工，會期延至六月，又因東主國政變再延至十一月，蘇俄乃利用此一機會，以訪問、招待外交及經援攻勢，爭得不少亞非國家的支持。到八、九月間，形勢已對毛共不利。九月廿九日陳毅招待「中」外記者時說：「如果美帝國主義決心要把侵略戰爭強加給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他們明天就來。讓印度反動派、英帝國主義者、日本軍國主義者也跟他們一起來吧，讓現代修正主義者也在北面配合他們吧，最後我們還是會勝利的」（註一八）。九月三十日毛共支持的印尼政變失敗，共黨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十月底，籌開亞非會議的四十五國外長會議中，除日本及

尼泊爾外，其餘均贊成蘇俄與會，毛共乃轉而杯葛，使會議流產。十一月廿九日蒲隆地與毛共斷交。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達荷美、一月五日中非共和國，先後與毛共斷交。同年十月廿日迦納與毛共中止外交關係。一九六七年九月廿六日毛共關閉駐突尼西亞使館。同年十月三十一日印尼與毛共中止外交關係。一九六七年七月幾內亞驅逐毛共臨時代辦（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毛共與柬埔寨斷交）。這造成蘇俄在亞非地區進展的良好機會，而毛共則陷於孤立。

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爆發，毛共面臨蘇俄的直接威脅，於是在外交鬥爭方面不得不改變策略。同年尼克森在競選活動中，表示了他想與毛共接近的意願，而毛共也似乎頗有狐假虎威的企圖。

回憶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美國與毛共間第一三四四次華沙會談時，原決定同年五月廿九日舉行第一三五次會談，但五月十八日毛共就通知美方，說它自己的駐華沙「大使」到時候來不及返任，而且「目前沒有什麼事情可談」，建議再移至十一月中旬或下旬舉行。八月廿日捷克事件爆發，毛共於九月五日前，用強制手段建立了最後幾個省級「革委會」，十月底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新黨章草案，決定了三反路線。十一月十五日美國通知毛共，將會談延至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或十一日舉行。同月廿四日「新華社」重新發表了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該報告的第八節末尾說：「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這是毛共準備重施「談判」也是「針鋒相對」的鬥爭之故技的預兆。廿五日毛共駐波蘭大使陳東通知美大使斯托塞爾，願於一九六九年二月廿日恢復會談。廿六日，偽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發表談話，除重申其「絕不以原則作交易」的立場外，並於宣佈願與美恢復會談後，接着說：「到那個時候，美國的新總統

已經上任一個多月了，美國方面大概就可以拿定主意了」。這次會談因廖和叔投奔自由事件而生波折，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毛共發表聲明譴責美國，同月十八日再發聲明，中止會談的舉行。但上引毛共發言人那幾句話的動機與含義，是頗值得玩味的。

一九六九年的軍事衝突，使毛共深恐蘇俄會真的給它一次大的突襲。同年十月七日，毛共為與蘇聯同月廿日舉行邊界談判而發表的聲明裏說：「中國政府從不諱言，中蘇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原則分歧，中蘇之間的原則鬥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但是，這不應該妨礙中蘇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正常化」。不久，毛共又下令學習毛澤東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發表的「關於重慶談判」。這是說，毛共已把蘇俄當作暫時和平共處的對象之一，要與它展開「針鋒相對」的談判。在西方，自一九六九年就任總統以來就高唱談判時代來臨的尼克森，一方面與蘇俄開始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一方面又與毛共於一九七〇年一月廿日恢復了華沙會談。他不瞭解共黨認為「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進行的談判，就是鬥爭，就是針鋒相對」（註一九）。或許他已被匪俄雙方利用而不自知。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尼克森向國會提出的外交咨文，表示美國不願再以領導者自居，那也可說是一個多元世界的構想。同年春以來，自由世界的輿論，高談超級大國與三角關係。其影響之一是，自由世界的若干國家，都不願再信賴美國而採其獨自的外交路線；其影響之二是，若干中小國家，感覺其失去往日在兩大集團之間的橋樑作用，跟着也就失去了發言權和從雙方獲取援助的機會，因而就激發了反超級大國的情緒。毛共的反超級大國理論，正是此時所提出的。而同年九月路沙卡第三次不結盟會議之後，其聯合中小、反對超大策略就已定型（註二〇）。

蘇俄對於毛共不管社會制度是否相同，都可以和平共處的說法（註二一），以及其反超級大國的理論，指為模糊了階級意識，為帝國主義服務。然而，在目前所謂「三角關係」中，蘇俄那一角遭受了冷落。

一九七一年二月廿五日尼克森在其世局咨文中，公開表示其願與毛共接近的意願，並且說：「美國準備將可見到北平在國際社會中擔任具有建設性的角色」。同年四月廿六日，由洛奇主持的一個委員會，建議允許毛共進入聯合國。本已展開乒乓外交的毛共，乃於七月十六日與美國同時宣佈，邀請

尼克森於明年五月前訪問北平，並積極圖謀混入聯合國。前者對美國說是「針鋒相對」，對蘇俄說是旁敲側擊。後者表示毛共要把聯合國變為聯合中小反對超大的鬥爭舞台，把美俄雙方當作鬥爭對象。

說來也許純粹是時間上的巧合，毛共對外加強攻勢且暫時獲逞，乃是尼克森就任總統以後的事。一九六九年四月毛共召開九大，被某些西方人認為是毛共文革的結束。毛共恢復外派大使，被認為是迎合談判時代緩和對外姿態。他們對九大制定的三反路線既熟視無覩；對於毛共把七十年代看作「將是人民革命風暴在全世界更大興起的年代，將是帝國主義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潰的年代」（註二二），也充耳不聞。

一九六九年毛共藉援助與賑災爭取了「第一中間地帶」，一九七〇年毛共乘與加建交蟲惑了「第二中間地帶」。一九七一年毛共認為「許多的中小國家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這兩個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註二三），毛共已在和兩個超級大國展開面對面和兩手對兩手的鬥爭。毛共以為「美帝國主義的星辰正在隕落」（註二十四）。然而，蘇俄似乎不願意隕落，正與毛共在世界各個地區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九七一年七月下旬，「經互會」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第廿五次大會，通過了經濟一體化計劃，這表示蘇俄進一步加強對東歐的約束。跟着，蘇俄不斷在巴爾幹附近舉行軍事演習，那是一種鎮懾性的炫耀武力。八月中旬以降，毛共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及羅馬尼亞，據傳都加強了軍事勾結。而周恩來會有於今秋歷訪地拉那、貝爾格萊德和布加勒斯特之說。由於毛共對外活動加強，蘇俄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將於十月初旬訪問河內，總理柯錫金於同月中旬訪問阿爾及利亞，下旬訪問加拿大，十二月上旬往訪挪威與丹麥；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則於九月下旬訪南，十月下旬將與包戈尼訪問法蘭西。

早在今年五月廿七日，包戈尼會往開羅與埃及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八月九日俄外長葛羅米柯在新德里與印度簽訂了二十年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它對於其他亞洲國家乃至日本，都不會放棄爭取。而當北韓、北越對毛共與美勾搭心存疑懼時，蘇俄又豈肯袖手旁觀？外交戰是越來越激烈了。九月七日，蘇俄在聯合國散發長達十六頁的小冊子，指責毛共違反列寧主義，實行大國

主義，妨礙革命和反帝國主義的團結，且與華盛頓勾結反蘇。此一事件是意義深長而耐人尋味的！

在西方，從一九七〇年八月的俄德條約，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廿三日的美、英、法、蘇四國柏林問題協議，一般人都認為是蘇俄緩和西方，以便對毛共加重壓力的步驟。蘇俄的外交向來是一石多鳥，我們絕不可把事情看得如此單純。但其一切活動都含有對付毛共的意義，却也不便一概否認。

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匪俄雙方都正在邊境上增加兵力。我們不能認為一向以政治鬥爭為主的共黨，會輕意訴諸武力。可是，毛共害怕蘇俄摧毀它的核子基地是事實，而蘇俄不喜歡毛共核武器的發展，難道不是事實？預測戰爭會不會爆發，不是一件頂聰明的事，因為人們不常把戰爭預先排在日程表上。同樣，人們即使想在外交上維持均衡，但國際間的均衡，也永遠無法長期存在。

過去的十年，匪俄衝突是愈演愈烈了。今後將如何發展呢？「和」既不可能，就只有等待歷史來解答了。

註一：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紅旗」載：「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

註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紅旗」編輯部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

註三：史達林：「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為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而作。

註四：「論列寧主義基礎」原為一九二四年初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所引見「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八九頁。

註五：一九六九年一月廿九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中共的對外政策」第九篇。

註六：以上所引俱見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載「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

註七：乃偽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八次大會所提出。

註八：毛共「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乃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七屆六中全會所提出。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劉少奇在毛共八大第二次會議報告中提及總路線時，曾強調：

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同月廿六日陳雲、李富春、葉季

壯等乘列席華沙公約政治協商會議之便晤黑魯曉夫請求經援，但未獲結果，毛共乃又加重重業與輕工業同時並舉，洋生產與土法生產同時並舉，合稱五並舉，又稱兩條腿走路。

註九：一九六四年五月九日「人民日報」載「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九日給蘇共中央的信」。

註一〇：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紅旗」雜誌第八期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註一一：在同一報告中，黑魯曉夫先稱讚了印度解放了果阿、第烏和達曼。

註一二：一九六九年五月廿四日毛共聲明。

註一三：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打倒新沙皇」！

註一四：同年八月十三日「新華社」北平電。

註一五：一九六五年三月廿三日「人民日報」載「評莫斯科三月會議」。

註一六：一九六六年一月布里茲涅夫訪問偽蒙，簽訂為期二十年的「友好

合作互助條約」，以毛共為假想敵。同月間謝列平率團訪問河內。

註一七：三國為越南、寮國、柬埔寨，四方為北越共黨、「越南南方民族

解放陣線」、寮共、施亞努流亡集團。

註一八：一九六五年十月七日「人民日報」。

註一九：一九七一年七月廿五日「文匯報」刊載署名洪流的問答式文章：

「從重慶談判談起」。其結論如此。

註二〇：一九七〇年七月初，法總理府計劃和領土整治部長安德烈·貝當古率團訪問毛共。七月十四日周恩來會見法記者，提出「超級大

國」「主宰世界命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論調。同年九月路沙卡不結盟會議後，毛共聯中、小、反超大之說，愈趨明朗而積極。

註二一：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七日偽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出席南駐平使館酒會，在南大使之後講話時稱，和平共處原則，「應該適用於一切國家，而不管它的社會制度是相同的還是不同的」。

註二二：同年元旦毛共「兩報一刊」社論「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

註二三：一九七一年元旦毛共「兩報一刊」社論。

註二十四：同年八月一日毛共「兩報一刊」社論。